

當代文學論叢

鄭毓瑜 著

性別與家國

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

上海三聯書店

當代文學評論

郑毓瑜 著

性别与家国

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郑毓瑜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4

(当代女学者论丛)

ISBN 7-5426-2285-4

I. 性... II. 郑...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②汉赋—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599 号

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

著 者 / 郑毓瑜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版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7.25

ISBN 7-5426-2285-4/G·769

定价:15.00 元

总 序

曹 晋

入选“当代女学者论丛”的三本专著,其论述领域分别体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学术与文化的全球化整合语境中的海外“汉学”、“国学”、“美国华裔研究学”的一个构型。

海外“汉学”作为一种参照,从知识论到方法论对中国学术都已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成长和转型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传统的海外“汉学”(Sinology)研究侧重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属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学术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海外“汉学”的重镇之一,学者们已从早期的译介作品,转向了各种古典文学议题的深入研究。首先,美国学者立足古典文学中固有的用语,发挥他们所擅长的严谨的逻辑思维与分析能力,对本土学者因过于熟悉而缺乏省查的现象进行开阔而精细的阐释,论证严实、结论新颖。其次,在尝试新方法的同时,美国学者非常强调扎实的材料功底,其研究成果并未炫耀深邃的方法理论,许多美国学者把广泛涉猎各种西方理论作为积累一种解读东方情境知识的学养,但终其一生,他们游弋于古代典籍的浩瀚海洋之中。另外,美国学者的切入点因自身学术传统和生活场域与中国学者的殊异,显得比较关注科技、经济、社会变迁等力量对文学的接受影响,当本土学者难以脱离社会历史与文化建构的固有观念对研究的束缚的困限时,海外学者对经典的批判与重建往往弥补了大陆学者所缺失的

洞察,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黑格尔(R. E. Hegel)对中国明清小说的经济、技术因素的研究(曹晋,2000)。当然,跨文化阐释的确存在对研究材料理解与翻译的多义性(Polysemy),因为美国学者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是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文本传输的意义消费者,其研究结果是植根于美国学者的知识结构与自身的文本解读的情感相结合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译码”更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中实现的。鉴于此,我们评价海外成果,不必以绝对正确或是错误定论是非。

耶鲁大学东亚系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从事学术研究数十年,曾经获得各种荣誉和奖金。例如,她曾获得美国国家文学科学基金会(即著名的 NEH)奖金,美国高等教育基金会(ACLS)奖金,美国惠特尼(Whitney)人文学科荣誉奖金,耶鲁大学 Whitney Griswold 人文奖金,也被选为耶鲁 Whitney 人文研究中心教授成员。目前,孙教授与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作为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1 and Volume 2*)的主编,正在孜孜不倦地进行修订、审阅工作。在美国汉学界,孙教授可谓把中国文学与社会性别相结合而进行研究的开风气者,她与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女诗人作品选》(*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是第一部大型英译中国古代女性诗集,也是最重要的英译汉籍资料之一,其“通过文本的陈列来呈现历史上女性写作的真实状况,抓住了(美国学者)明清妇女研究潮流的核心”,即“恢复历史的真实情境远远多过(本土学者的)‘颠覆’或‘重建’”,编者“致力于以传统中国的观念作为价值认识的渠道,尽可能回到当时的立场中阐释既定制

度下女性所获得的权力与能动性”(张宏生、梅玫,2003)。孙教授在《文史知识》发表的《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2004年第11、12期)一文中,强调应该突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影响和西方文化上的“他者”视野,才会有益于人类文化发展的真实性和完满性,这也是孙教授很有代表性的论点。无论是从1993年她在耶鲁大学主办“明清妇女与文学研讨会”的学术胆识,还是孙教授的论著,其结果对某些研究盲点都是一种有力的推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原书名为 *Six Dynasties Poetry*)是孙教授1986年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2001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繁体翻译本(大陆学者钟振振译)。六朝诗歌的研究在中国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海外汉学家的见解对国学研究仍是弥足珍贵的借鉴,同样的题材,西方汉学家的论述与切入点会别开生面。孙教授在《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为研究对象,把“表现”和“描写”用作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观念来讨论,强调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表现与描写的互动中,逐渐发展的一种绵密又丰富的抒情文学。全书通过对这两种诗歌要素的聚焦审视,用具体方式表达其中的复杂关系,赋予古典诗歌现代的阐释。这本书在海外汉学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是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有关六朝文学的全面性著作,而且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多元——书中不但讨论广阔的山水面貌,也兼及咏物和人体美的问题。从这本书的讨论可以看出,自然写景的技术与艳情的趣味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二者也与中国文学史的概念息息相关,所以它在欧美汉学界中曾经激起了热烈的反应,它使读者看到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文学传统的异同,也使人看到中国古典描写艺术的特殊性。这次的中文简体版增补了《揭开陶潜的面具:经典化与读者反应》一文,讨论了陶渊明与经典建构的关系,从中可见孙教授

解读陶渊明的丰富潜力。同时,在社会性别研究方面,这本书也起了“带动”的作用,例如在陶渊明的一章,有关《闲情赋》的讨论使人对诗人的女性观有了深刻的理解。鲍照的一章则提出“女性”与“知音”的概念之重要联系,令人耳目一新。还有,最后有关宫体诗的一章更是以女性美作为讨论的对象。虽然由于文本的局限,讨论的重点不得不涉及“男性”的观点(即目前社会性别研究中所谓的 male gaze),但其启发性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孙教授这本书不但早已被译为中文(台湾允晨版),也已经出了韩文版。现在希望借着上海三联书店的中文版(简体版)能产生更广泛的读者影响。

“国学”研究,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就倡导国学研究之道应“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研究院缘起》)。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重要研究领域,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与路径,曾获得“国科会杰出奖”的台湾大学中文系郑毓瑜教授所著《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一书就再现了这种探索。郑教授专长在六朝文学与文化研究,研究成果曾获台湾国科会杰出研究奖,并曾获选为美国 Fulbright 访问学人,担任捷克查理大学讲座教授,自 2004 年起担任台湾大学出版的性别研究学术期刊《女学学志》主编等。在《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一书中,郑教授认为透过对于屈原、宋玉作品的解读与化用,汉晋辞赋作者在“神女”象征、“家国”想象及“直谏”方式上都有更新的发展,包括西汉宫廷贵游的辞赋创作、东汉以来形成的士族政治、魏晋间弥漫的老庄玄学,以及由一统帝国至于分裂乱局的处境变换,这一切都触引了汉晋士人对于楚骚的型式及其意义进行当代性的思索。对于整个中国文学

史的发展而言,这些不绝如缕的变调新声其实彰显了楚骚体系最为新颖宏阔的文学价值。本书以屈原、宋玉的作品作为模写的源头,探讨两汉魏晋辞赋的拟骚系列,究竟如何挪用(不只是被动套用)过去的书写形式,温习(而非因袭)前人应对环境的姿态,从而也摸索出自己于当代环境机制下的存在位置与表现方式。楚骚于汉晋辞赋作品中因此并非以原貌存在,而比较像是被重新理解与接受的一种对策。不论是独白或设问,楚骚所开展的对话关系一直是环绕在君/臣、道/势之间,而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特色且源远流长的政治对话策略。其中,或是感伤放逐,或是傲然自美,或是引事论理,或是讥讽怒斥,作者个人的情志意态总是因为对应一个或现或隐的权势对手,而折射出出入进退、离合往还的层次图谋,并不能单单视作逞才竞藻的修辞用心;同时也因为这明白的攻防意图,楚骚在修辞手法上除了接收自诗经的事物比兴,尤其开拓出以性别改扮抗拒阶级压制的“神女”象征;以地理经验引发对反放逐的“家国”想象;以及透过生死以之的“直谏”方式,标记知识分子于家国政权体制中昂然独立的身份认同。

这本书一方面呈现中国古典文学在“性别”与“家国”议题上的特殊风貌,一方面在书中也适时与西方理论(如 Sigmund Freud, Michel Foucault)及西方汉学家研究成果(如 Donald Holzman)进行了对话。而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 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文,点明了本书在国际汉学研究上的重要性:“21 世纪到来的今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在经济和文化进入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各国文学也应朝向国际化发展前进。因此,研究亚洲文学的专家们,无论以中文、日文、法文或英文写作,也开始以共通的语言沟通。这意味着他们提出相似的议题,运用相同的专业词

汇,并以共通的方法进行分析。本书正是台湾大学中文系郑毓瑜教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朝向国际论述的卓越贡献。”

美国华裔研究学是亚裔研究学的一个分支,从属于少数族裔研究学(Ethnic Studies)的学术范畴。目前美国华裔研究大致集中在几个大的学术领域:历史、文学(包括比较文学、文艺批评)、族裔研究学、人口学、教育学以及法学研究。周敏教授便在社会学领域展开了华裔和亚裔研究。她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在美国学术界已被列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必读教材。她的主要著作有《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天普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 1993 年最佳学术著作荣誉奖,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出版中文版);《在美国成长:越裔青少年如何适应美国社会》(罗素尔萨矾基金会出版社 1998 年版,合著,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 1999 年最佳学术著作奖)。周敏教授新编的《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周敏论文集》一书收集了她作为加州大学著名华裔社会学家和亚裔研究学家在美国一流的学术期刊和论著上发表的有关华人社会的 15 篇精选论文。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波特斯博士特为本书中文版作序。相信本论文集也将会在中国学术界(尤其在海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产生影响。

在美国,华裔族群是最大和最早移民美国的亚裔族群。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末。由于近年来受到国际移民潮的激发,美国华裔的人口总数从 1960 年不足 24 万人激增至 2000 年近 300 万人之多。占亚裔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次大战前的华人社会,由于受到诸如 1882 年的排华法案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反亚排亚法案的负面影响,成为一个长期以来在以白人为主导的主流社

会边缘徘徊的弱势少数族裔群体。在经历了二次大战和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后,华裔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提高。但是整个族群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还时常被白人以自相矛盾的眼光另眼相看——既被看成是永久的外国人,又被看成是模范少数族裔。在本论文集,作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目光,展示出华人社会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画面,深入地探讨和解释了华人移民和华人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本论文集涉及的主要学术课题和研究成果包括:新老唐人街的比较;市中心唐人街与郊外华人聚居区的比较;华人创业精神和华裔聚居区经济;华裔社区组织;中文学校和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华人移民妇女;华人移民第二代的成长和移民子女的教育;反华排华运动和排华法案对华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华人社会发展的影响;华人移民家庭结构的变迁;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同化;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与华人居住模式的变迁;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关系等等。

致力于发展姐妹情谊或是友谊是多种文化主义和全球女性主义者,通过差异以及尽管存在差异而依然使妇女能够在多样中取得统一而联合行动的策略之一,鲁宾·摩根(Robin Morgan)所著《姐妹情谊跨全球》(*Sisterhood is Global*, 1984)一书就是例证。虽然“汉学”、“国学”、“美国华裔研究学”各有论述的面向,但却同时列入“当代女学者论丛”,这正是得益于学术姐妹的因缘情谊,愿她们的敬业操守、学术造诣等女学者的本色激励更多胸怀世界且努力服务于全球妇女权利的人们。

“当代女学者论丛”的创意在获得上海三联书店黄韬副总编的认同之后,及时得到了台湾允晨文化与里仁书局等出版机构和三位作者的

免费版权授权书,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精心审读了笔者的序言,并提出珍贵建议。在此,主编者向支持这套论丛的所有学者与海内外出版工作者表示真切的谢意。同时感谢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5 年的项目支持。

参考文献

1.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1999),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nditional China —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 Morgan, Robin (1984), *Sisterhood is Global*, N. Y. : Anchor.
3. 曹晋(2000),“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0,4。
4. 孙康宜(2001),《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台湾允晨文化。
5. 郑毓瑜(2000),《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台湾里仁书局。
6. 周敏(1995),《唐人街》,北京商务印书馆。
7. 张宏生、梅玫(2003),《重建经典》,《读书》,2003,5。

序：朝向国际化的古典文学研究

康达维*

21 世纪已经到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将面临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在经济和文化进入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各国文学也应朝向国际化发展前进。因此，研究亚洲文学的专家们，无论以中文、日文、法文或英文写作，也开始以共通的语言沟通。这意谓着他们提出相似的议题，运用相同的专业辞汇，并以共通的方法进行分析。本书正是台湾大学中文系郑毓瑜教授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朝向国际论述的卓越贡献。

郑教授虽然最近才开始赋学研究，但她一直是位认真用功的学者。在 1996 年台北和 1998 年南京所举办的第三和第四届国际赋学会议中均有论文发表，成为赋学领域的专家。郑教授对于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透彻精深，同时在西方语言写作修辞和文学理论方面也有令人佩服的研究成果。因此，她能够精读原典并与广泛涉猎欧美批评理论所得之宝贵心得紧密结合。

在本书中，郑教授对于早期“赋”传统的三项基本主题进行多方调查研究：在女神的主题方面，尤其针对男性对女神的探求作一讨论；地理方面，特别着眼于“赋”详细描绘各种旅行的过程；以及学官反抗朝廷政府威权所产生的不满和抱怨。凡此种皆是文学传统中受到广

* 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泛讨论的主题,由这些基本的论点再作进一步的专题探讨,譬如:官员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威权独裁政体的问题;“认同”,包括性别、宗族和对于国家的认同问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欲望和困扰。

在最早期的文学类型中,可清楚看出涉及上述问题的文体即是“赋”。因此,郑教授书中所探讨的不只是单一的类型或是某一特定主题,而是切中要点地涵盖了文学、思想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等核心议题,时间上不仅局限于汉、魏、晋期间,更几乎贯通了整个中国历史。

本书的第一章是关于追求“女神”——或是借用爱德华·史凯佛(Edward Schafer)中译名称“神女”——的主题。郑教授将这个问题的起源追溯到屈原《离骚》与一般认为是宋玉所撰的《高唐赋》和《神女赋》,说明这些作品如何为“神女主题”树立基本的典型,而其中主要涉及“欲望”的讨论,尤其着重情欲和压制欲念的部分。郑教授将主题来源——《登徒子好色赋》纳入讨论范围,虽此赋非关神女,却是首先探讨男性学者借着抗拒美色以表现自身高尚道德的作品之一,其中我们可看到朝臣将情欲的压抑作为一种忠君与否的考验。从郑教授的观点看来,统治者对于朝臣欲望的压抑等于剥夺了为人臣者不论为人丈夫或父亲“身为男性的权利”;为人臣者在比喻上变成“被去势阉割”的角色。不论人们同意或反对这个论点,这样的性别评论尚未广泛应用在“赋”的研究中,而郑教授有意带领赋学研究进入新的方向,将是大家所乐于见到的。

郑教授检视汉、魏晋期间以各种不同方式模仿转化屈原宋玉作品模式写作的“赋”诗。其中,一般认为是司马相如所撰的《美人赋》(虽然在我看来,美人赋并非司马相如所作)转化男性学者抗拒美色的模式,将压抑情欲的复杂心理呈现在文章当中,而不是将原作品(《登徒子好

色赋》)的主题机械化地循例处理(简宗梧教授则认为《美人赋》可能为《登徒子好色赋》的仿作对象。请参见《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页118—122)。这个问题详细推敲了一系列关于“压抑情欲”的作品,其中,以陶潜《闲情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此外,与《高唐赋》、《神女赋》关系更密切的作品是曹植的杰作《洛神赋》。

对于这些作品,郑教授提供了创新同时忠于原味的解读。举例来说,虽然她也接受某些既有的论述,认为《洛神赋》暗讽曹丕和曹植之间的血缘关系,但是更超越这个过于简化的说法,带给读者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她指出传统中的神女只是皇帝取乐的玩物,然而,曹植却将“神女”从“物品”转化为自信自足的形象。根据郑教授的看法,这代表了曹植希望抵抗剥夺其行动和自由的政治压迫。同样地,不论精读《洛神赋》是否足以支持郑教授的结论,她已经为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

在最早讨论神女主题的作品中,追求女神的爱慕者,多半落得黯然神伤的失败下场。大卫·郝克斯(David Hawkes)很久之前就指出“追求女神”源起于宗教仪式,即是巫师对神明的探索。举例来说,在《湘君》和《湘夫人》中,巫师极尽所能地追求吸引河神,却仍然无法得到青睐。在《离骚》中,这个基本主题开始脱离宗教,进而演变成成为一种表达不满时政的方式,即是郝克斯所谓的“tristia”(哀诗),用以表达“诗人面对昏君时心中的忿忿不平与怨怼之情;同时也是面对残酷的命运和腐败、险恶、令人无法理解的社会之下所产生的悲哀”^①。郝克斯推测,

① 《女神的探索》(Quest of the Goddess),载《中国文学类型研究》(塞瑞尔·柏区[Cyril Birch]编著,加州柏克莱大学出版公司,1974年),页54。

在 *tristia* 中经常出现的“哀感情调”实际上可能来自“忧郁的性格特征与巫师传统认为面对人生无常与天命难测借由颂诗所抒发的挫折感”^②。屈原对于自然之神“宓妃”的追求，很明显地与巫觋传统有关。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尚未获得解答，就是：屈原的追求探索到底是世间人情的反映，还是宗教性质的仪式？换句话说，他到底是找寻仁君的臣子，还是一个追求神明的巫师？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待“追求神女”这个主题，我们会不会和汉代的各家注释犯下同样的错误，认为不仅只有《离骚》，甚至连《九歌》的字里行间都寓含政治的弦外之音？

这些问题也许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郑教授书中所讨论大部分的赋，我们对于作者、写作年代和写作背景所知有限。举例来说，有关宋玉作品的作者身份即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大胆地揣测宋玉写作《高唐赋》和《神女赋》的动机是非常冒险的，因为甚至连《洛神赋》这篇作者身份确定无疑的作品，既可以视为曹植忠于曹丕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曹植自身反抗威权的陈述。作者资料明确尚无法十分肯定其真正的写作动机，更何况作品的作者资料不详呢？^③

在郑教授讨论关于神女的主题的章节中，最具争议性作品之一为陶潜的《闲情赋》。郑教授明确地指出，读者必须了解那些引发陶潜《闲情赋》写作灵感，具有“闲情”传统的赋，其中包括张衡、蔡邕、应瑒、王侃等人的作品。郑教授发现，虽然这些作品主题都描写某个受人爱慕的对象，但是并未提及这些人物的反应，作者也没有从第三者的角度提供

② 同注①。

③ 《洛神赋》各家注释的完整摘要，请参见 K. P. K. Whitaker 所著《曹植的洛神赋》，《亚洲主流》(Asia Major)4(1954)，页 36-56。

任何评论。因此,“神女主题”在天子和人臣之间的关系,显得缺乏冲击力。郑教授随后提出对于陶潜《闲情赋》的简短讨论,她认为《闲情赋》是“情欲压抑”传统中的“旷世杰作”。

除了陶潜的《闲情赋》,其他关于“情欲压抑”主题的赋零散不全,较不具代表性,因此很难去诠释每位作者的真正用意。但是我相信郑教授的结论是准确的,这些赋在情感上或心理上对于神女主题的处理,较宋玉、屈原更具深度。郑教授的研究成果补充了1954年由詹姆士·罗勃特·海涛(James Robert Hightower)^④所作的研究。海涛先生翻译《闲情赋》之前的七篇作品,并与《闲情赋》分析比较。但是并未给予《闲情赋》高度的评价。他发现所谓“十愿”,长篇铺陈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显得“机械化”又“单调”。郑教授将《闲情赋》和之前的作品作了一个更简明的比较,她比较应场《正情赋》中一段和《闲情赋》相似的行旅描写,作者同样表达夜里观星,倾听飞雁哀啼的孤寂之感。和海涛先生不同的是,郑教授认为陶潜赋对于复杂的情感有更深刻的表现。

郑教授更深入分析阮籍艰涩的作品——《清思赋》作为研究的结论。她充分利用唐纳·何曼(Donald Holzman)对于这项工作的初步研究,对于《清思赋》的诠释却不同于唐纳·何曼。何曼认为这是阮籍“对于某些神秘或半神秘超感知美感的理论论述”(《诗与政治》[*Poetry and Politics*],138)。而郑教授反驳《清思赋》中的神游有别于其他由屈原作品得到灵感,并涉及描写追求悲天悯人的君主或名士未果而受挫的“神游”。与其将超自然的游历作为文章的安排,阮籍表现出来的

④ 请参阅《陶潜的赋》,载《哈佛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 (1954):169—230,请参考页169—196。

是一个实际的王国,在其中他可以快乐自在地安居。因此,取代超越感知而模糊不可知的乐土,阮籍拒绝声光的超感知世界是“一个全新实现经验”。对郑教授来说,阮籍在《清思赋》中对追求神女的表现并不完全是逃离现世的作法,而是一种生存其中的方式,而这又是一处创新独到的见解。

郑教授在第二章讨论另一个早期赋传统的重要主题——记录详细的旅行过程。郑教授认为这些研究是“地理主题”的一部分,由楚辞屈原的作品所衍生出来的问题。郑教授将一系列赋的作品作了分类,这些赋都与早期中国学官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相关:如何处理被驱逐和流放时的疏离感和孤独。流放的过程本质上即包含了旅行,如同郑教授所言,最早描写流放例子是屈原在《楚辞》中的诗作,根据她的看法,屈原的诗并不是单纯抱怨放逐或思乡的表达,对于诗人来说,流放反而具有建设性和正面意义。诗人体会流放的深刻意义,使自己克服与环境的疏离和依附关系。郑教授以“反流放”说明这种现象,而这项说法来自比较文学学者克劳迪欧·吉伦(Claudio Guillen)^⑤最早提出的一种概念。

郑教授将诗赋描写旅行过程的早期作品,追溯到屈原《离骚》,颇令人意外。虽然屈原的“行进”一开始是逃亡的旅行,而且大部分涉及对天堂旅行的想像,但是我并不确定《离骚》是否可作为反流放的有力例证。虽然《九章》更清楚地表达官员被朝廷流放的不满,但是有关放逐的主题却不如《离骚》的表现明显。我较认为屈原旅行的目的并不完全

⑤ 请参见《流放和反流放的文学》(1976),《国外书籍 50 种》(*Books Abroad 50*), 页 271—280。